

# 第一章

## 多民族区域的历史发展

### 一 原始人口迁徙与文明的交流

#### 1. 西域考古与原始居民

中国西北新疆地区，古时候属于泛称的西域。2000多年前汉代史籍中首次出现西域的概念，其地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以后也泛指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部地区。尽管各朝史籍对西域的记载范围不同，但其中心部分都包括今天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西域原始人类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这个涉及新疆人类历史源头的问题，随着20世纪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新疆已有关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报道，如交河故城西南台地发现一两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工具。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更多。不过，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大多与铜器或铁器并存，年代有可能早到中石器时代，也有可能晚到青铜、甚至早期铁器时代。西域周围地区，如前苏联中亚、南西伯利亚地区，中国的甘肃、青海地区，及印度等地的新石器遗址年代均在距今4 000年以前，在这之后基本都步入了青铜时代。西域处于其中，不会有很大例外。综合这些情况，我们认为

西域确有距今4 000年以前的人类石器文化遗址，因此，我们对西域远古时代的叙述也以此为始。至于此前的一些考古结论和历史叙述，则有待于今后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有关西域原始居民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近10多年来，随着考古和西域古代人种及种族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域原始居民的来源、分布、迁徙、融合、发展等情况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西域尚未发现类人猿或猿人进化的遗址，据此可以推知，西域原始居民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周边迁徙而来的。虽然目前从古人类学上全面阐明今天新疆境内的古代人种和种族问题，现有的资料还不够充分，但根据今和田地区、罗布泊地区、天山东段南麓哈密地区和伊犁地区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可以肯定迁入新疆的原始居民存在西方和东方两大人种支系成分。

## 2. 西域西方人种

西方人种指古代欧罗巴人种。这一部分种族迁入古代新疆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毗邻新疆的中亚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乌兹别克斯坦切舍克—塔什（石）洞穴中曾发现旧石器时代（莫斯特时期）的尼安德特人类型化石；东哈萨克斯坦曾出土具有克罗马农人特点的原始欧洲人种的两具头骨（一具属新石器时代，另一具属铜石并用时代），其它一些地区曾出土有极狭面的新石器时代头骨，这类头骨与欧洲地中海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的头骨有诸多的共同点。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断，这一部分原始形态欧洲人种进一步向东迁徙到古代西域。二是新疆考古和人类学资料。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两种类型的原始欧洲人种成分在新疆境内铜器时代以后的古人类学材料中已经发现。中国古人类学著名学者韩康信先生指出：“至少在铜器时代末期，具有原

始形态类型的欧洲人种已经分布在罗布泊地区，目前还无法具体确定他们是从什么地方、通过什么途径来到新疆腹地的，然而古墓沟（属罗布泊地区）文化居民的人类学特征表明，他们与分布在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甚至伏尔加河下游的铜器时代居民都有密切的种族联系。”他又指出：“具有地中海东支形态类型的欧洲人种成分似乎出现得较晚，在洛浦（属和田地区）山普拉丛坟墓、罗布泊楼兰城郊墓地及阿拉沟（天山东段南麓）古代丛坟墓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类型。其中，山普拉和楼兰两处的基本成分就是这种类型。”韩康信先生并大致勾勒出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原始人口的迁徙状况：“中亚的地中海人种成分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一方面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向东推进到罗布泊地区，而这种类型也很可能是汉代楼兰国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很可能在这个地区与时间上更早占据罗布泊地区的原始形态的另一个欧洲人种成分居民相遇，并与后者一起参与了古代楼兰国居民的组成。”另一方面，一部分地中海人种成分沿塔里木盆地北向东渗进到天山东段地区，并且在渗进过程中可能比从其南方向东渗进的同类更多地与当地居民发生混杂”。而天山以北的原始人口状况是：“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分布在伊犁河上游 天山以北 的古代塞人和乌孙（人）主要成分是另一种人类学类型，即以短颅型为基础的帕米尔—费尔干类型，或称中亚两河类型，其中也有中亚两河类型与安德洛诺沃（欧洲人种）变种类型的过渡特点。他们与中亚地区的其他塞人（不包括南帕米尔塞人）、乌孙时期的居民有明显相近的体质特点，与前述原始形态欧洲人种类型和地中海人种类型有明显的形态差异。”<sup>①</sup>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载《新疆古尸》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年2月版 第214~223页。

### 3. 西域东方人种

东方人种指蒙古利亚人种。目前,能够确切说明古代新疆这部分人种和种族的来源和分布的资料还很零碎,但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可以作几点初步的判断。一是公元前蒙古利亚人种已迁入古代新疆。“大概在接近公元初,随着民族大迁徙开始,蒙古利亚人种类型特点程度不等地向正在形成的中亚两河类型活动于今中亚和天山北部)‘沉积’”<sup>①</sup>。二是从哈密焉布拉克墓地、罗布泊突厥墓地考古和人类学材料中推测,“可能至少在中国汉代以前,东、西方人种在新疆境内存在反方向渗入。但相比之下,蒙古利亚人种向西的渗入比较零碎,不如西方人种成分的东进活跃”<sup>②</sup>。三是在阿拉沟、哈密焉布拉克及较晚的楼兰和昭苏伊犁地区的古墓中,东、西方人种成分共存的现象(包括共存于同一墓地或同一墓穴)比较普遍,这是种族奴隶随葬,还是不同种族的家族成员同穴埋葬尚无从推断。

综上所述,古代新疆的原始居民是从周边迁徙进入的。迁徙主要来自西、东两个方面,迁徙的路线大致是沿草原(包括山脉深处的草场)、河流和盆地周围的山前冲积平原绿洲而运动的。由西方迁入的欧罗巴人种居民在西域分布的范围相对较广,他们逐步向东发展,至早期铁器时代已移动到今东疆哈密一带。从东部迁入的蒙古利亚人种主要分布在西域东部,他们逐步向西迁徙,在早期铁器时代,已生活在今伊犁河流域。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证明,不同方向而来的西域原始居民在迁徙中相遇,并在人

(俄)金兹布尔格:《与中亚各族人民起源有关的中亚古人类学基本问题》载《民族学研究所简报》俄文版,1959年第31期。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载《新疆古尸》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年2月版 第214~223页。

种成分上融合。

#### 4. 古代文明的交流

考古发掘和研究也反映出西域居民有自己的土著社会和文化习俗。这种社会和文化习俗既有西域本土的特点，又有周边文化习俗的影响。西域中部的土著特点比较明显，周边则受东西方社会文明的影响较大。从中可以推测出原始居民迁入西域以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融合发展时期，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西域社会文明。

不同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在西域社会的周边，东部毗邻的黄河流域中原文明发展相对较快。公元前2 000多年前，当地的夏部落已建立了中原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公元前15世纪前后，统治中原的商朝已步入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前后，西周、东周分封制已较为普遍了。这一时期，西域也在向阶级社会过渡。而毗连西域西部的古代中亚两河流域直至公元前10世纪至前7世纪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前6世纪开始处于古波斯王朝的影响下。由于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的系列山脉和帕米尔高原限制了古波斯王朝进一步向东方扩展其影响，西域与东部毗邻的中原农耕文明及中原北方的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流容易得多，因此，西域与东部的交往源远流长。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相互间交往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东部部族人口迁徙到西域，古代西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及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彼此交融，逐渐成为共性日益增多的古代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内外学者一致公认，对西域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汉文史籍；有关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西域（包括中亚）的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汉文史料。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65年—前221年）的汉文史

籍《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及大致成书于此前后的《逸周书》等 其中有不少西域地理、历史传说的记载。《史记》、《汉书》对西域的记载更加丰富和翔实。这些记载的特点之一 是将西域包容在中华文明中，如在地理记载中，将古代西域的自然地貌、山川河流、物矿出产与中原地区的相关内容并列记载于史籍中。以《山海经》为例 其书将西域中南部的昆仑山、东南部的阿尔金山与向东延伸的今甘肃河西祁连山、今陕西秦岭统一称为南山 又称秦岭为“终南山”即自西域昆仑向东绵延的南山至此而终结。书中还有中原黄河源于西域之说，以为古西域之葱岭河（今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于阗河（今和田河）筹汇流后（即今塔里木河）注入渤泽（今罗布泊）由此潜入地下 经南山（今青海境内积石山）而形成黄河之源。此说虽是误识，并于唐代渐解，但反映出将古代西域与中原有机结合在一个整体中的思想。

至于对古代西域与中原相互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传说记载则更是比比皆是。如《竹书纪年》记载：“商中宗太戊二十六年（约公元前1612年）西戎来。王使王孟聘西戎。”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周穆王巡游西域。相传周穆王率大队人马西征，在西域受到当地首领西王母的欢迎。周穆王向西王母赠送了丝绢、铜器、贝币等礼物，西王母则在瑶池设宴款待周穆王，席间赋诗相互祝福。周穆王十七年（约公元前985年）西王母又来朝，“宾于昭宫”<sup>①</sup>。至今在敦煌莫高窟423号洞窟的壁画上，以及1978年甘肃酒泉西家滩出土的五凉时期5号墓前室的壁画上，仍然可以看到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聚的生动形象。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是信史，但反映出西域与中原源远流长和好交往的关系。

<sup>①</sup>《竹书纪年》卷下。

目前考古发掘材料中，有两类出土文物印证了西域与中原的物质交流。一是西域输往中原的玉石。西域产玉很早就闻名于中原。中原历代君王“贵用禺氏之玉”。禺氏即西北之“月氏”人，分布于西域进入中原孔道即天山东部至敦煌一带，所以中原称西域之玉为“禺氏玉”。另外有昆仑玉，产于昆仑山。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了距今3 200多年的殷王武丁妻妇好墓葬，出土随葬玉器756件，基本上都是昆仑玉制成的。敦煌玉门关之得名，显然是指西域玉石输入必经之关隘。二是中原输入西域、或经西域转输往西方的中原丝织品。至今出土最早的西域丝织品来自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年西域墓葬中。丝织品难以保存，早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丝绸即经西域西传至波斯，传入西域当更早于此。另外，前苏联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世纪生活于西域阿尔泰山一带的呼揭人墓葬中有中原战国时期的铜镜，其形制、大小都与中原河南陕县上封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而古代西域流行的漆器，无疑也是从中原输入的。

## 二 西域与北方民族政权及中原王朝

### 1. 匈奴统治西域

战国至秦汉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或山间盆地生活的定居或半定居的居民，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大多有城郭，史称“城邦诸国”。这一时期游牧于河西一带的月氏部族逐渐强盛起来，向西发展到阿尔泰山和天山东端部分地区。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月氏势力又深入到漠北高原，控制了当地匈奴游牧部族，迫使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公元前209年）送太子冒顿为人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

年)，匈奴起兵反抗月氏，冒顿逃归，自立为匈奴单于。匈奴赶走月氏占据北方草原后，又南下与汉朝为敌。前200年（西汉高祖七年）冒顿率兵围汉高祖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迫使汉朝结好和亲。此后，匈奴开始向西北扩展，公元前177年左右其势力开始进入西域。

西汉初年，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分布的城郭诸国，号称“三十六国”其中东部的楼兰国位于今罗布泊西北势力较大。天山以北有塞人、乌孙人、呼揭人，他们以游牧为主，兼作狩猎，其中乌孙国（位于今哈密附近）、呼揭国（位于今阿尔泰山南麓）势力较大。此外，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有坚昆部，与呼揭和坚昆毗连的有丁零人，他们都是匈奴的部属。从社会发展阶段讲，西域诸国发展很不平衡，但基本上都已进入阶级社会。从国家规模讲，诸国大者数万人，小者千余人，所谓“国”实际上是以城郭为中心或以部落为中心的聚落人群。西域整体处于“各有君长，众兵分弱，无所统一”的状态<sup>①</sup>。

匈奴军臣单于时期（公元前161年—前126年）匈奴进入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东至大兴安岭，西至西域以西之塔拉斯河，北抵漠北，南距河套。匈奴政权机构由单于王廷、左贤王、右贤王三部分组成。王廷居中，左贤王辖东部，右贤王辖西部。匈奴统一西域之初，先以右贤王统辖，后由右贤王下的日逐王专理西域事务。公元前92年（征和元年）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幢仆都尉”，常驻于焉耆（今焉耆）危须（今和硕县东南）尉犁（今焉耆县南紫泥泉一带）三国间，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和财物。《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一种

<sup>①</sup>《汉书·西域传》。

毛毡)罽(一种毛织品)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可见匈奴统一西域后,主要是以政治上的统属、经济上的征收实物(同赋税),来体现与西域的统属关系的,并未实行对西域的直接管理。这也是当时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统治方式。匈奴是中国北方草原上兴起的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虽然它与西域的统属关系比较松散,一些边远地区甚至只是间接控制或名义上归属,但匈奴王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西域有所作为的政权。

匈奴统一西域,在中国历史上和西域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开创了西域与内地统一的先河,使西域与内地的关系从文明的交流步入政治的统一;其二,密切了原先分散林立、互不统属的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促使西域内部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其三,奠定了中原统一西域的基础,提供了治理西域的经验。虽然匈奴统一西域只是一种局部的统一,但这种局部的统一,拓展了西域、北方草原和中原之间文明的交流,确立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为中国历史上范围更广泛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四,匈奴统一西域后,实际上还控制了西域以西的地方,使东西方交通更加畅通。史称:自乌孙以西安息(今伊朗);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sup>①</sup>。就是这个情况的反映。

## 2. 两汉中央王朝统一西域

西汉初期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匈奴经常攻掠沿边地带,成为汉朝的边患。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前87年)随着国力的恢复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决定改变政策,以武力对抗匈奴。汉朝政府制定了联络西域、共同打击匈奴的战略方针。西汉

<sup>①</sup>《史记·大宛列传》。

联络的对象是大月氏国。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被迫迁到西域伊犁河、楚河流域一带，一直敌视匈奴。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西汉派张骞率百余人使团出发，前往联络大月氏。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截留，10年后逃脱。这时大月氏人又被乌孙人赶出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到今中亚阿姆河一带。张骞率众继续追寻大月氏人，首先到达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大宛国王欢迎张骞一行，并派向导送他们经康居国到达大月氏。但这时大月氏已征服大夏，领有了阿姆河两岸，这里水草肥美，气候适宜，远离匈奴，周边安定，大月氏已不愿与汉朝联合远征匈奴。张骞一行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取道西域南山（今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尔金山北麓）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后乘匈奴内讧，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回到长安。

张骞通西域，前后13年，去时百余人，回时仅2人，历尽了千辛万苦，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使命，但仍有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在于：这是自秦汉中原统一以来第一次派往西域的使团，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带回了各种有关西域的信息，特别是有关西域政治格局及大国乌孙的信息，对于汉朝制定统一西域的方针大略起了重要的作用。张骞带回有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今中亚一带）的情况，收集到有关奄蔡（今咸海与里海一带）、安息（帕提亚波斯）、条支、塞琉古朝、叙利亚、黎轩（托勒密朝埃及）、身毒（古印度）等国的信息，使中原王朝第一次了解到西域以外的世界各国。直到今天，我们描述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中亚及其周边历史时，还要倚重张骞出使的有关记载。

汉朝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开始了武力反击匈奴。汉朝首先出兵占领河套以南之地，然后向河西推进。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秋，汉军绕道居延海（今甘肃北之居延海）向天山东端的

匈奴势力发起攻击。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归降汉朝。汉朝在河西设立了酒泉郡 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三郡 成为有名的河西四郡 )次年 又出征漠北匈奴 大获全胜。自此“金城(今兰州) 并南山(今祁连山) 至盐泽(今罗布泊) 空无匈奴”。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汉统一西域的条件成熟了。

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张骞奉诏 再次率300人使团，随带价值巨万的金帛出使西域。这次出使以乌孙为主要对象，兼向沿途各国派遣副使。使团到达乌孙时，乌孙王猎骄靡已年老，属下三部各自为政，属官多惧匈奴而不了解汉朝，所以不愿与汉结盟反匈奴，而愿派使节随张骞报谢汉朝，实际上是想进一步了解汉朝的实力。乌孙使节数十人到长安，见汉朝人众富厚，归报其国 乌孙王下决心与汉结好。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乌孙王向汉室求婚，汉朝嫁宗女解忧公主予猎骄靡。双方联姻实际上是政治上结盟。张骞所遣副使也先后到达西域其它城郭小国，及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周边国家 这些国家也遣使随汉使前来中原。

汉朝频繁出访各国，西域汉使“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sup>①</sup> 引起匈奴的强烈不满 匈奴骑兵常袭击汉使 西域诸国也嫌劳扰 楼兰、姑师攻掠汉使尤甚。楼兰、姑师分别为西域南、北二道的起点。汉要控制西域 首先得控制南、北二道 要控制南、北二道 首先得控制楼兰和姑师。因此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朝出兵 虏楼兰王 破姑师 并将烽燧亭障从河西酒泉延伸到玉门。

<sup>①</sup>《汉书·西域传》。

汉虽暂时控制了南、北二道，但匈奴对西域的影响仍然很大。西域仍“畏匈奴于汉使焉”，一些西域邦国迫于无奈，不得不两面结好。楼兰王对汉武帝陈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sup>①</sup>是这种状况的最好反映。为了彻底扬威西域，彻底教训匈奴，汉朝进行了两场大的战争，一是“两伐大宛”，一是“五争车师”。

汉朝对于西域西部之强国大宛，本执和好结盟的政策，“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但是大宛国统治者分为两派，一派以贵族昧蔡为首，对待汉朝态度较好，但势力不大，一派以大宛王毋寡为首，主张依附匈奴，拒绝与汉和好。毋寡非但不予宝马，而且下令攻杀汉使，劫掠财物。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数万伐大宛，第一次出征失利。越两年，李广利率军再伐大宛，大获全胜。大宛王毋寡被属下杀死，汉军立昧蔡为王，大宛献马，双方订立和好盟约。毋寡弟蝉后封为王，仍送王子人质，进献“天马”，维持附属盟邦关系。

大宛归附汉朝，对西域诸国产生了极大影响，西域诸国争相与汉结好，进献贡物，送子人质。即使有的当权者愿意依附匈奴，国内也有反对意见。如楼兰王安归仍依附匈奴，其弟尉屠耆不满。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汉朝除掉安归，立尉屠耆为王，并下嫁宫女为楼兰王夫人。楼兰更名鄯善国。西域南道自此畅通无阻。

但是车师、姑师改名，情况不同。车师距近匈奴，仍直接受匈奴的控制。车师依附匈奴，意味着西域北道交通阻隔，因此汉朝必须与匈奴争夺车师。这场有名的“五争车师”战争，自公元前99

年至前60年进行了约40年最后以汉朝的胜利告终 汉朝终于控制了西域北道及自车师后王廷西向的道路。西域最后一个大国归附中原，彻底改变了西域的隶属面貌。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 匈奴势力最终退出西域 汉朝取代匈奴 统一了西域。从此 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

公元25年，东汉建国。匈奴趁中原改朝换代之机，又开始与东汉争夺西域。东汉国力不如西汉。《后汉书·西域传》称：“自建武至于延光 西域‘三绝三通’”，是双方争夺西域的扼要概括。所谓“三绝三通”，实际上是匈奴与中原王朝交替控制西域的过程。东汉“绝”于西域之时 正是匈奴控制西域之日。反之亦然。东汉统一西域的道路虽然比较曲折，但统一仍是大的趋势。

从整体上讲 公元前177年后 西域统一于匈奴 公元前60年后 统一于西汉王朝 公元25年后 匈奴、东汉交替控制西域。由此可见，统一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发展的主流；此外，西域诸国多为分散的绿洲小国，西域统一后，在一个统一的政体之下各方彼此协调关系，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中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域，西域统一于中央王朝，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加快。如东汉班超任西域都护 10余年间(公元91年至102年)西域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97年(永元九年)班超以朝廷名义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条支(今叙利亚)虽因风险未能渡海 但史称：“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sup>①</sup>可见统一西域后，中国的影响已达世界主要文明地区。

《后汉书·西域传》。

### 3. 汉朝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

汉朝统一西域的过程，也是逐步完善治理西域的过程。汉在确立西域统治地位之前，公元前101年（太初四年）已在西域北道中心之地轮台（今轮台）及渠犂（今库尔勒以西）设置使者校尉。使者校尉率士卒屯戍积谷，既守护交通、供应汉使往来，又作为汉朝基本军事力量，必要时统领西域盟国之兵完成军事任务。使者校尉的设立，开创了汉在西域设官驻军的先河，而轮台、渠犂则是汉朝在西域第一个直接治理的地区，这两方面在西域治理史上都有十分突出的意义。前77年（元凤四年）之后，汉朝又应楼兰王尉屠耆之请，在罗布泊伊循城（今若羌米兰东）设伊循校尉，驻军屯田，镇守西域南道。使者校尉府和伊循都尉府为汉朝统一西域及治理西域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汉朝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西域中心乌垒城（今轮台县东策大雅），西域都护府成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之设立有两个要点：一是将西域定为直属中央的郡（相当于今之省）一级区划。汉之都尉是辅佐郡太守的郡一级的军职；或有不置郡太守而专设都尉者，其权位颇重。西域都护同此。所以，汉统一西域后，虽然没有等同内地设置郡县，但西域的管理级别等同于郡省级。二是对西域实行“使护”治理方式。“使”者，差遣特派；“护”者，督统护理。西域都护府为汉朝中央派出的军政合一机构，都护总掌大纲、监督综理要务。

汉朝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设置机构，任命官吏。西域都护府是最高军政合一的机构，下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职，军事、行政官兼有。都护的主要职责是颁行朝廷号令，镇抚西域诸国；督察政务，协调地

方指挥军事讨伐动乱。平时则以驻军屯戍、守护交通为主。《汉书》称西域都护一共有18任。现已知姓名的有10任，即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按汉之定制，边吏三年一转。但西汉末年，朝政废弛，都护任职无定期。如但钦公元1年（元始元年）至13年（始建国五年）任职，任期13年。

西域都护府之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设置的伊循都尉府，治所在楼兰地区，扼西域南道交通咽喉。汉制部分边郡设属国都尉，治理所属周边民族。伊循都尉与此大致相当。另一个机构是公元前48年（初元元年）设立的戊己校尉府，治所在车师前部交河城（今吐鲁番交河古城，后移高昌，今吐鲁番高昌故城）。戊己校尉府下设丞、司马各一，侯五，以驻军镇守、屯田守护为主，扼西域北道交通咽喉。两个机构均属中央直辖（或谓属敦煌太守管辖），仅受都护节制。

都护、校尉、都尉所在驻地轮台、车师前部（或高昌）、楼兰，形成控制西域腹地的三足鼎立之势。

汉在西域的治理机构又分为中央派出与地方册封两个系统。上述都护府、校尉府、都尉府是中央派出机构，除直辖治所之地外，主要负责督控地方；地方事务则由汉朝册封的西域各君长国官员具体管理。各君长国均有汉朝政府册封任命的地方官员。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一些大国官员如乌孙国的大吏、大禄、大监，还颁赐了与内地最高级官员佩带几同的金印紫绶（后改为铜印墨绶，以符定制）。这些地方官员构成了汉在西域的基层管理人员。西域本地人也有任汉官校尉者，如弥国太子赖丹就是汉昭帝任命的校尉。

（2）驻军镇守、屯田戍防。汉朝驻军主要集中在乌垒城及周

阊(包括轮台、渠犂)伊循城和车师前部交河城,后移至高昌三处。其中乌垒城及轮台、渠犂驻军最多,约在2 000人上下,其余两城驻军数百至千余人。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乌孙归属后,汉又于其地赤谷城屯戍。另外,敦煌也设校尉统兵,以为西域后援。西域驻军屯田所获,除军队自养外,还供应汉朝往来的官员使者。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治边措施,为历代所采纳。汉朝在西域的屯戍驻军虽然有限,但各地驻军互成犄角,形成系统的镇防布局,对于汉朝统治西域作用显著。

(3)绘制舆图 统计户口。疆域舆图、户籍人口是国家统治权力的象征,也是治理的重要手段。周秦以来,中国历代皆十分重视,一般均由重臣掌管。汉朝统一西域后也十分重视。汉朝已有西域舆图,只是未能流传。史载:桑弘羊在论证轮台屯戍时利用了当时的西域舆图,“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sup>①</sup>。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即查明并掌握了属下诸国的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疆域四至。《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了西域都护所辖49国情况,另有罽宾、乌戈、山离、乌戈、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等国,虽也有详略不等的记载,但均注明“不属都护”字样,以示区别都护所辖属国范围。

(4)镇抚诸国 督察境外。汉在西域治理政策以抚为主,镇抚并用。凡内外有事,“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由中央派往西域任职的官仅数十人,驻军仅数千人,不得不以“抚”字为主。联姻、遗赠厚币、倚重册封的地方官员,是“抚”字的重要内容。“镇”者是镇定而非镇压,主在安定社会。凡遇争议,特别是人口、地界划分等事,统由汉朝官吏进行协调;迁址等易引起动荡之事,

<sup>①</sup>《汉书·西域传》。

亦由汉朝官吏协调实施。如公元前62年(元康四年)经使者校尉协调将车师国迁往渠犁安置以避匈奴的攻掠。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西域都护为乌孙大小昆莫划分地界和人口等等。至于无法安抚协调的诸事,如攻掠、入侵,则由都护调集诸国兵力予以打击。宣帝年间乌孙内乱兵困解忧公主及汉使都护郑吉调遣诸国兵马予以平定,即是其例。

(5)遣子人质 贡献方物。周秦以来中原王朝一直有遣子人质的制度。即令藩属送王子入朝为人质,作为政治信誉的抵押和归属的象征。汉朝将此制引入西域。实施这一制度的另一个意义是,中央政府通过对质子的影响,进一步密切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诸国质子因此在长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优裕的生活。此制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王莽篡政时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各国纷纷反抗“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究其原因盖因延曾人质长安“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故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贡献方物,也是属国臣服的一种象征。初为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赋者上之求于下即国家征收的钱物贡者下之纳于上,即诸侯奉献的钱物。汉在西域实行以贡代赋的制度,要求属国贡献方物,缴纳土产,作为中央王朝与属国关系的一种表示(境外非属国而贡献者另当别论)。凡诸国前来贡献,汉朝必有赏赐馈赠,其价值大大超过贡物,目的是厚贿以达安抚。而诸国也多有以贡献获取回赠,作为与中原经济交流的方式。

西域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汉朝使者往来不断,沿途属国负有接待供应之责,也是一种变相的赋役方式。惟各国地理位置不同苦乐不均。

(6)维护治权,引渡逃人。引渡逃入是国家主权的又一象征。